

【家校合作】

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

——基于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

骆婧雅 朱新卓

【摘要】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当前的普遍现象，中产阶层家长尤为甚。文章基于2022年在全国8省市开展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学业和身心健康是家长最为焦虑的内容，学业监管是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2)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正向影响其教育焦虑。(3)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远高于间接效应。(4)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在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中，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是逻辑起点，教育期望是直接原因，教育竞争感知是关键环节。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降低社会分化、完善社会建设；建构低筛选、弱竞争的基础教育结构；弱化文凭的等级性和教育竞争性；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关键词】家长教育焦虑；中产阶层家长；家长参与；教育成层

【作者简介】骆婧雅，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武汉 430074)；朱新卓(通讯作者)，男，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社会学(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摘自《教育与经济》(武汉)，2024.2.40～4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新时代我国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研究”(课题编号：BHA180137)研究成果。

一、问题提出

2018年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的《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68%的家长焦虑孩子的教育问题，仅有6%的家长不焦虑^[1]。可见，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演变为一种群体焦虑。尤其是，那些拥有较高文化水平、中等以上收入、从事专业技术以及各级管理岗位的中产阶层，为帮助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高度参与、密集投入子女的教育^[2]，造成“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矛盾现象，并由此引发基础教育生态失衡。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试图通过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压减校外培训机构供给的方式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缓解家长教育焦虑。但是从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本应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课后服务，在部分地区变成了学生统一的“晚自习”或集体补课^[3]；家长不惜与培训服务提供者互利性“合谋”，把“明补”变为“暗补”，“地下教培市场”应运而生^[4]；家长教育焦虑有增无减^[5]。由此可见，“双减”政策无法使家长从教育焦虑的泥潭中抽身。

米尔斯是当代西方最早研究中产阶层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在不稳定且模糊不清的社会中，中产阶层时常困扰于“能否获取地位”“地位能否被承认”等问

题,因此经常处于“地位的恐慌状态之中”^[6]。近年来,国内研究也发现,我国中产阶级“不上不下”的现实状况和“可上可下”的未来预期让中产阶级产生强烈的身份威胁和地位恐慌,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进一步增长和蔓延^[7]。由于我国中产阶级的先赋性资本较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积累不足以支撑后代继承或超越他们的阶层地位,因此作为他们获得目前阶层地位主要渠道的教育,就成为其后代维持家庭阶层地位、避免向下流动的重要甚至唯一渠道^[8]。中产阶级基于对教育促进社会成层与流动功能的感知和判断(即教育成层认知),高度认同并预期此功能会进一步强化,于是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高度甚至过度重视和参与,这就是中产阶级家长教育焦虑的源头。因此,本研究将以家长对教育成层功能的认知为逻辑起点,探寻影响中产阶级家长教育焦虑的关键要素,建构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以期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家长教育焦虑的内涵与成因

近年来“教育焦虑”这一表述备受关注,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见诸各类新闻媒体报道中,与“鸡娃”“内卷”等现象如影随形^[9],用以指代家长高度重视、高度投入、密集参与子女教育的行为。目前国内研究对家长教育焦虑概念的界定大多套用心理学的“焦虑”概念,认为家长教育焦虑是家长对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10]。这种将家长的教育焦虑简化为情绪状态的界定方式与现实情境中大众所呈现和理解的教育焦虑并不一致。实际上,当前备受社会关注和国家关切的家长教育焦虑现象不仅包括家长个体偶发的焦虑情绪,更包括家长为了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高度参与、密集投入子女教育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生态系统失衡,可见已有研究并没有抓住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的本质和精髓。因此本研究将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界定家长教育焦虑的内涵。广义的家长教育焦虑是指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因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的忧虑、生气等情绪状态,以及密集参与子女教育的行为表现;而狭义的家长教育焦虑特指情绪状态。本文采用广义的界定。

关于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学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引导着家长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子女竞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11]。(2)中产阶层的地位焦虑。中产阶级期望通过重视、参与和经营子女教育进行社会地位的自我复制,实现阶层的代际传承^[12]。(3)家庭少子化趋势。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孩子成为家庭实现代际流动的“唯一希望”^[13]。家长们竭尽所能地为孩子争夺优质教育资源,唯恐其在教育竞争中居于劣势。(4)教育制度设计不当。我国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重点学校制度确定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格局^[14];现行的选拔性考试制度将教育评价的甄别功能无限放大;“职普比大体相当”政策与大众想要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背道而驰^[15],这些都导致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中、高考竞争优势,只得不断加大教育投入。(5)校外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和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16]。(6)家长过高的教育期望。当孩子的学业表现难以达到家长的期望时,家长往往产生焦虑情绪^[17]。

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自古有之,“独生子女”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实行,现行的中高考制度已沿用多年,如今义务教育的均衡化程度也远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为何当下的家长反而更加焦虑?家长过高的教育期望是其教育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校外培训机构与新闻媒体也正是利用和放大了家长的这一心理,可是家长的高期望又因何而生?已有研究虽然从文化传统、教育制度、社会环境、个体因素等各个角度解释了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但并没有析出家长教育焦虑现象产生的逻辑起点,也缺乏对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因果链条推断。

依据米尔斯的观点,中产阶级地位恐慌的根源在于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当社会流动增强,个体的社会地位存在更多的能动性和不确定性时,这种波动不定“使人总处在压力和忧虑之中”^[6]。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人们的社会身份与阶层地位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动,始终存在的阶层下滑风险使得中产阶级的地位焦虑不断升级。在文凭社会中,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的对人

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18],意识到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高含金量文凭对于其地位维持与继承至关重要的中产阶层家长,高度投身于助推孩子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行动中,将重视子女教育、投资人力资本视为消解地位恐慌的出口^[19]。可以说,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就是其地位焦虑在教育领域的体现^[20]。由此可见,家长对教育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功能的认知才是其教育焦虑形成的根源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将深入剖析家长对教育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功能的认知与其教育焦虑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

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具体是指家长对教育在个体职业获得、个体社会阶层地位获得中作用有无以及作用大小的认识和理解。现有文献没有直接关于教育成层认知的研究,但是可以从教育价值观的相关研究中窥见一二。

家长的教育价值观是指家长对教育价值的认识 and 评价^[21]。教育的价值可分为本体性价值(如教育促进个体人性与生命潜能发展的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如教育有助于职业获得、收入提高、社会地位提升等方面的价值)。当前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是受到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影响^[22],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讨论后者。有调查显示有 70.50% 的家长完全同意或比较同意“让孩子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变命运”这一观点^[23],可见家长对教育工具性价值的高度认同。此外,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教育期望,当家长持有“实际效用”(接受教育是为了社会流动)的教育价值观时,更期望子女读名校^[24]。在工具性价值中,个体所从事的职业、收入水平以及社会地位都可以用其所处的阶层地位代表,可以说教育的成层功能是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凝结,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是家长工具性教育价值观的核心。所以本研究将集中考察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对其教育焦虑的影响。

(二)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

布劳与邓肯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探讨了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

发现社会的工业化水平越高,职业分化越精细,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将越依赖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25]。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筛选标准从“政治挂帅”转向“绩效原则”,教育等自致性因素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26]。尽管近年来,高等教育扩张导致教育收益率整体呈现增长减缓甚至下降趋势^[27],甚至有学者指出教育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作用逐渐弱化^[28]。但事实上,高等教育已然成为当前社会个体获得特定身份地位的敲门砖,是劳动力市场判断个人能力、筛选人才的首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成层功能不但没有被弱化,反而是被加强了^[29]。此外,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主要指的是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而重点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稀缺资源,具备筛选精英的功能,在劳动力市场占据有利位置,其文凭也相对保值。简言之,在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的今天,“读书仍然有用”,但更重要的是“读好书才能有用”。

在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助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背景下,大多数中产阶层家长高度认同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的成层功能,将教育看成是改善个体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30]。然而,家长越是认同教育的分层功能,就越容易陷入对孩子教育失败、未来发展受限的忧虑。他们担心孩子上不了好高中,最终上不了好大学,以致最后无法在社会上高质量地就业。这种连锁型的担忧导致家长产生强烈的教育焦虑。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对其教育焦虑有显著正向影响。越是认同教育成层功能,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越焦虑。

(三)家长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

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强烈会在一定程度上拔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据调查显示,87% 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普通高中(而非职业高中),90% 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60% 以上希望孩子进入“211”“985”高校^[23]。然而我国目前的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往往难以满足这样普遍的高教育期望:国家针对高中阶段的职普比的一贯政策是保持普职规模的大体相当;截

至2022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2所,其中“双一流”高校仅147所,占高校数量的4.9%。所以就现实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家长的教育期望是难以实现的,家长的期望越高,孩子达不到期望的可能性越大,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现实困境导致家长极有可能面临希望落空的窘况,进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教育焦虑。已有研究也证实,家长的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成正比^[31];家长的教育期望与孩子当前的学业成绩差距越大时,会产生越高的教育焦虑^[17]。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其教育焦虑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四)家长对教育竞争感知的调节作用

相关网站统计了全国各省份的高考录取率,以江苏为例,2021年一本上线率只有30.1%^[32]，“211”及“985”高校的录取率分别为6.7%和1.8%^[33],由此可见我国重点高校入学机会竞争的激烈程度。由于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一教育序列中,前一阶段教育获得的优势和劣势都将累积到下一阶段,并得到强化^[34]。所以,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产生的传递效应,不断向中学和小学蔓延,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成为家长们竞争的对象。此外,“普职大体相当”政策更是将初中后教育分流置于学生教育生涯分化的关键性节点,导致初中阶段的教育竞争白热化。而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直接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实现,当教育竞争加剧时,家长教育期望实现的难度和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尤其是初中阶段家长普遍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进入普高尤其是重点普高。他们越是感知到普高尤其是重点普高入学机会的竞争激烈,对教育期望难以实现的担忧会随之加剧,这让家长教育焦虑进一步加深。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即越是感知到教育竞争的激烈,家长的高教育期望越容易导致高教育焦虑。

基于此,本研究拟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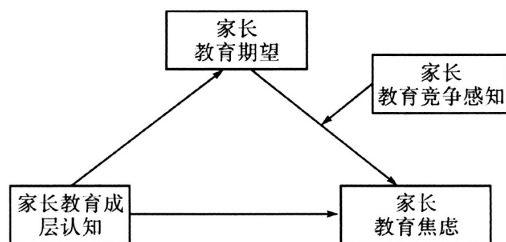


图1 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

课题“新时代我国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研究”课题组2022年11月对全国8省(直辖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

本研究采取了分组分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样本选取方式:首先,从我国东、中、西部分别选取了江苏、山东、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西、重庆等8个省(直辖市);其次,在每个省(直辖市)中选取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再次,在各市/乡镇选取1-2所初中,每个年级抽取不少于两个班;最后,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老师将问卷发放给学生家长。本研究共回收问卷12451份,剔除填写问卷时长低于7分钟的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0764份,有效回收率达86.45%。由于本研究将中产阶层界定为:从事国家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办事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大中型个体工商户等职业;且满足大专及以上学历或者家庭年收入在10万-96万的群体,经过筛选后最终获得中产阶层有效样本4913份,占比39.46%。

(二)变量说明

1. 自变量: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

本研究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教育是实现阶层晋升的最重要通道”这一观点的认同程度,测量其对教育成层的主观认知。采用Likert 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家长越认同教育的成层功能。

2. 因变量:家长教育焦虑

对“家长教育焦虑”的测量,采用课题组自编的“家长教育焦虑”量表。该量表由“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和“家长焦虑情绪表现”两部分组成。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受访者的教育焦虑程度越高。

“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子量表由学业辅导、学业

监管、培训规划、家校沟通四个因子组成,在这些方面的高度参与被称为密集参与。“家长焦虑情绪表现”子量表包括学业焦虑、身心健康焦虑、品行焦虑、未来发展焦虑四个因子,共13道题项。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

3. 中介变量:家长教育期望

本研究通过询问家长对子代进入普通高中(相较于职业高中)、重点普高(相较于一般普高)以及重点大学(相较于普通大学)的态度,测量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家长的教育期望越高。

4. 调节变量: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

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受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客观现实、校外培训机构的营销宣传以及同辈群体间的比较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询问家长在面对此类情境时的感受,测量其对教育竞争的感知。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家长感知到的教育竞争越激烈。

5. 控制变量

本研究在探讨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时,对有可能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家庭层面以及学生层面因素进行控制。家庭层面包括家长性别、学历、职业地位、家庭年收入,其中学历和职业地位取学生父母双方最高者;学生层面包括学生性别、年级、同胞数量、学习成绩。

(三)分析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运用Hayes编制的SPSS PROCESS程序,借助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法对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一步,使用Model 4检验家长的教育期望在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第二步,采用Model 14检验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

五、研究结果

(一)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总体情况

以理论均值3分作为衡量家长是否存在教育焦虑的标准,小于3分为基本不焦虑,大于等于3分代表存在教育焦虑,其中大于等于3分但小于4分为“比较焦虑”,大于等于4分为“非常焦虑”。调查发

现,从整体上来看,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均值为3.108,表明初中阶段的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53.88%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存在焦虑,其中45.39%的家长感到“比较焦虑”,感到“非常焦虑”的比重为8.49%。

具体而言,初中阶段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家长焦虑情绪维度的均值为3.444,68.84%的家长在焦虑情绪维度上得分达到3分及以上,存在教育焦虑情绪,其中42.32%的家长比较焦虑,26.52%的家长非常焦虑。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维度的均值为2.773,低于理论均值3。从占比来看,仅33.22%的家长在教育参与行为维度得分在3分及以上,达到“密集参与”标准。

在家长教育焦虑情绪的内容指向上,“学业焦虑”“身心健康焦虑”“品行焦虑”“未来发展焦虑”四个子维度的均值皆高于理论均值3。其中学业焦虑维度得分最高($M=3.735$),身心健康焦虑次之($M=3.473$),再次是未来发展焦虑($M=3.363$),品行焦虑得分最低($M=3.203$)。可见,学业和身心健康是中产阶层家长最为焦虑的内容。

家长教育参与行为的四个子维度中只有学业监管的均值高于理论均值3,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学业监管($M=3.179$)、家校沟通($M=2.864$)、学业辅导($M=2.711$)、培训规划($M=2.337$)。表明学业监管是初中阶段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

(二)教育期望在教育成层认知和教育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家长的成层认知程度能显著正向预测其教育焦虑($\beta=0.277, t=20.219, p<0.001$),假设1得到验证。放入中介变量教育期望后,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程度对教育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eta=0.177, t=11.809, p<0.001$),且教育成层认知程度对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显著($\beta=0.433, t=34.957, p<0.001$),教育期望对教育焦虑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beta=0.231, t=14.971, p<0.001$)。家长对教育成层的认知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家长教育焦虑,而且能够通过教育期望的中介作用预测家长教育焦虑,教育期望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

应的63.83%和36.17%,假设2得到验证。

(三)教育竞争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

将家长教育竞争感知度放入模型后,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能够正向预测教育焦虑($\beta=0.595, t=54.390, p<0.001$),教育期望与教育竞争感知度的交互项对家长教育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beta=0.043, t=4335, p<0.001$),说明家长的教育竞争感知可以调节教育期望对教育焦虑的预测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可知,低教育竞争感知组的家长,其教育期望对教育焦虑的预测作用($\beta=0.040, t=2.512, p<0.05$)显著低于高教育竞争感知组($\beta=0.125, t=7.875, p<0.01$)。表明随着家长对教育竞争感知的增强,其教育期望更容易演变为教育焦虑。据此得到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影响教育焦虑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其参数估计值(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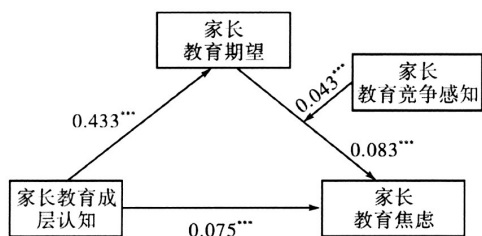


图2 家长教育焦虑形成机制的参数估计值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初中阶段家长“整体教育焦虑感”明显

初中阶段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这一方面可能与初中阶段课程难度加大,孩子在校时间延长,家长参与的时间和能力有限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受到“双减”政策的影响。学科类校外培训被大幅压减,部分期望通过校外培训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足的家长失去了参与途径。家庭内参与无能、校外培训参与无门导致初中阶段家长的教育参与程度偏低,这种无能为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担心和忧虑,使得初中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在情绪上的表现更为明显。

从家长教育焦虑情绪的内容指向上,学业和身心健康是家长最为焦虑的问题,也令家长最为矛盾

和纠结,因为在应试教育的实践中,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要获得学业优势往往要牺牲身心健康,要保障身心健康就很难获得或保持学业优势。学业监管成为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可见随着孩子学段升高,课程难度增大,家长在学业辅导方面的能力也会逐渐弱化,从直接的“教学者”转变为“监督者”。

2.教育成层认知是家长教育焦虑形成的逻辑起点

家长越来越相信孩子未来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地位取决于其升学结果和教育成就,于是他们期望通过精细地规划、密集地参与、大量的经济投入增强子代在教育竞争中的优势,但孩子学业成就能否确保其未来获得优质学校入学机会进而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地位,具有不确定性,家长们由此陷入了焦虑。

3.教育期望是家长教育焦虑形成的直接原因

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直接效应占比64.5%,间接效应占比35.5%,表明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对其教育焦虑的影响在部分意义上是由教育期望加以传导的。家长对教育成层功能的高度认同会转化对子女教育的高期望,而高教育期望与期望实现不确定性之间的落差进一步催生了教育焦虑。可见,家长教育期望是教育焦虑形成的直接原因。

4.教育竞争感知是家长教育焦虑形成的关键环节

“双减”政策提出加强培训广告管控,“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对于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主观性教育资源稀缺往往建立在客观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基础之上,只有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配置,高中阶段教育中的职普比过高和普通高中分层办学,高等教育结构“金字塔”化和文凭等级化,招聘与晋升中重文凭甚至重第一学历而轻能力等问题,方能从源头上破解家长教育焦虑的困局。

(二)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对策建议

1.降低社会分化,健全社会分层机制

家长对教育成层功能的认知是其教育焦虑产生

的逻辑起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人为限制教育在社会分层流动中的作用,这不仅在当今这个时代缺乏合法性,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们能做的就是降低社会分层分化的程度以及人们的生存焦虑,使家长更加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其未来获得何种社会地位。教育成层作用在现代社会增强具有合理性,但是强化教育资源与文凭的等级性并用优等文凭遮蔽教育与文凭所代表的素养与能力是病态的文凭主义,应当建构更合理、多样化的社会分层机制,使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获得重点大学文凭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适当下降,扩大劳动、能力、贡献在晋升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意义深远,价值重大。

2. 建构低筛选、弱竞争、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结构

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是教育焦虑形成的关键环节,而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竞争的白热化,症结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普通高中也存在教育资源的制度性分层,进而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因此第一步要弱化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建构多元、分类、特色化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回归基础教育的基础性,遵循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核心意旨;建构自然、融通、逐步后移的普职分流体制;在目前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强化普通高中的优质均衡、多样化和分类发展;改革中考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唯分数”“强竞争”的方式,尽快形成低筛选、弱竞争、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结构。

3. 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

家长过高的教育期望是产生教育焦虑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或及时根据孩子学习情况调整教育期望。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普及的时代,民众的教育心态和教育价值观也应当调整。应当逐步树立以能力和劳动为本位、追求个人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弱

化攀比和竞争心理的社会文化。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多角度、多渠道引导家长根据孩子的潜能和兴趣、学业表现调整教育期望,改变“唯有上好高中、好大学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重视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体价值,而非地位获得的工具价值,从一味追求更“好”的教育转向追求更“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

参考文献:

- [1]新浪教育.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报告发布:家长综合焦虑指数达67点[EB/OL](2018-9-16)[2022-11-16].<http://edu.sina.com.cn/zxx/2018-09-16/doc-ifxeuwwr4952738.shtml>.
- [2]朱新卓,骆婧雅.“双减”背景下初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特征及纾解之道——基于我国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实证调查[J].中国电化教育,2023(4):49-56.
- [3]郭志辉,梁号,王秦.“双减”政策下的校外培训:生存逻辑、效果反思与体系建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3):111-117.
- [4]杨小敏,阳科峰,张艳荣.“双减”政策有效落实的潜在困境与应对策略——兼论公共在线教育服务体系建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6):53-61.
- [5]张品,林晓珊.“双减”与“双拼”:教育政策大变革中的亲职焦虑与家庭教养[J].社会建设,2022,9(1):15-24.
- [6]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274-275.
- [7]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J].文化纵横,2016(4):32-39.
- [8]李强.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条重要渠道[J].学习与探索,2015(2):23-33.
- [9]人民网.读懂“鸡娃”背后的教育焦虑[EB/OL].(2019-12-16)[2022-11-16].<http://edu.people.com.cn/n1/2019/1216/c1053-31507681.html>.
- [10]陈华仔,肖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现象解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2):18-23.
- [11]杨小微.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的问诊、探源与开方[J].人民论坛,2019(34):104-105.
- [12]吕庆春.中产阶层的心理焦虑与符号消费之困[J].社会科学辑刊,2020(4):115-121.
- [13]林晓珊.“购买希望”: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J].

社会学研究,2018,33(4):163-190,245.

[14]杨磊,朱德全,樊亚博.教育真的内卷了吗?——一个批判分析的视角[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43(2):179-189.

[15]顾严.求解:结构性教育焦虑与结构性教育矛盾[J].探索与争鸣,2021(5):9-11.

[16]崔保师,邓友超,万作芳,等.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J].教育研究,2020,41(8):4-17.

[17]尹霞,刘永存,张和平,等.家长期望偏差与教育焦虑[J].青年研究,2022(1):40-48,95.

[18]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4(4):76-90.

[19]熊易寒.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J].文化纵横,2020,73(5):112-120,159.

[20]钱洁,缪建东.破解家长教育焦虑的可能路径:构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评价体系[J].中国教育学刊,2021(9):38-43.

[21]卢旭,杜时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众教育价值观的变迁[J].高等教育研究,2013,34(11):13-17.

[22]张国霖.家长的教育焦虑[J].基础教育,2016,13(6):1.

[23]余秀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民众教育心态[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11):39-48.

[24]余秀兰.父母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及其教育期望[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2-74.

[25]布劳,邓肯.美国的职业结构[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6]郭丛斌,闵维方.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教育研究,2009,30(10):5-12.

[27]张青根.高校扩招降低了个人教育的经济收益吗——控制能力异质性下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13/14):64-73.

[28]余秀兰.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7):9-15.

[29]郑育琛,武毅英.我国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再审视——基于对某省两所高校毕业生的调查[J].现代教育管理,2014(6):1-6.

[30]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4):194-200.

[31]丁亚东,薛海平.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35162名家长的实证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45-156,188.

[32]腾讯网.2021全国各省一本录取率,江苏一本上线率破30%,北京数据让人羡慕[EB/OL].(2021-9-18)[2022-11-21].<https://new.qq.com/omn/20210918/20210918A0E54P00.html>.

[33]腾讯网.重磅!江苏C9录取大数据!其985等院校录取分数线汇总![EB/OL].(2021-8-28)[2022-11-21].<https://new.qq.com/omn/20210828/20210828A0CIY700.html>.

[34]陈彬莉.教育获得之中的路径依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4):93-106,190.